



# 关于体育考古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思考

## ——《南方文物》“体育考古”专栏主持辞

体育,是通过人类活动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构成不同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特征的一种身体运动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来看,它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身体文化产物。当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与古代体育活动有关的文物资料被大批地发掘出来,从而使我们对古代体育文化形态的研究有了更为充实的依据。可以这样认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体育考古的方法进行实证性的分析,我们就能较完整地勾勒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生、发展及其演化的基本轨迹。

—

经过考古学学科多年来的发展,人们对考古学的内容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考古学的内容包括了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年代范围限定在古代,所以它较少涉及近代史,更与现代史无关;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主要的是各种物质的遗存,即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这是考古学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的历史学最重要的不同点;三是通过对实物资料的发掘、整理,最终达到对人类古代社会文化的研究。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具有不同的形态特点,因而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在方法与体系上也形成了不同的专题考古。其中,体育考古就是考古学专题考古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体育考古作为一种系统方法,是从体育史的角度出发,把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与体育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作为实物标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一门学问。从本质上讲,就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体育发展的历史。一般来说,考古学和古代体育史往往有着共同的研究资料。古代体育史的许多研究对象,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岩画到以后各个时代的绘画、雕刻、各种工艺品上的装饰及寺庙和石窟中的有关描绘,甚而许多体育活动场所等等,都属于体育考古研究的遗物和遗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体育考古首先是以研究对象的性质、活动形式类别的归属以及年代的鉴定为基础的,并以此达到复原古代体育文化具体形态的目的。由于体育考古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包括了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包括了历史考古学的范围。也就是说,体育考古既适用于研究史前期的体育史,又适用于研究历史时期的体育史,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

体育考古研究最初肇始于18世纪初对古代奥林匹亚遗址的发掘和整理。当时,首先由德国考古学家约·温克曼对奥林匹亚作了实地考察。之后,英国学者查理·钱德勒发现了宙斯神庙的遗址。19世纪开始,对奥林匹亚遗址的发掘全面展开。首先,由法国军事考察团发掘出了一批体育文物,并运往巴黎博物馆展览、研究。从1875年至1881年,德国考察团又在奥林匹亚遗址连续进行了几年的勘察、发掘工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珍贵文物和史料。对这些珍贵文物和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研究,标志着体育考古作为近代考古学的专题考古

方法之一,在考古学中具有了重要地位,同时也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打下了基础。

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体育考古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近代以来的体育考古除了少数直接的发掘、研究外,多数还是间接进行的。在世界范围内,体育考古的研究以欧洲、北非等地区开展得较为广泛。但在中国,由于近代考古学传入的时间不长,有关体育考古的研究多是间接进行的。这也代表了体育考古研究在初期的开展状况。进入20世纪后,考古学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作为其专题考古之一的体育考古研究,随着有关遗物、遗迹的不断发现,也逐渐开展了起来。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不断运用,使包括体育考古在内的专题考古研究,结束了以往那种靠猜测和推断来研究的时代。这进一步反映出了随着考古学的进步,体育考古的研究也出现了兴旺的局面。

## 二

从18世纪初体育考古这一考古学中专题考古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由于考古学的进步和大量有关古代体育活动遗物、遗迹的被发现,使这一研究方法日臻成熟,开始逐步形成了考古学中专题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不断地开始完善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体育考古学。

我们知道,以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代体育文化,其最终的目的还是通过对实物的分析,来探讨古代体育形态从萌生到发展、演化的全过程。这样,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引入到体育文化形态的研究中去,相应地就会从方法论上引出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专题考古学与体育考古学。

按照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有手段和方法等的不同,考古学可以划分为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及各种专题考古学分支。其中的专题考古学,亦叫特殊考古学,它主要是对一些跨时空的、比较重要或颇具规模的功能系统文化形态进行专门的考古学研究,它们都是由专题考古的研究方法发展而来的。在历来的考古学研究中,这类表现具有功能系统古代文化形态的专题考古学,往往得到多方面的反映和证实,如军事考古学、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和体育考古学等,都是专题考古学的重要分支。

我们知道,专题考古的研究对象,亦即专题性的人类遗存,都是古代文化形态功能系统的产物,也都具有一定的“功能”意义,并都可以归属于一定的功能系统。同时,还能够较系统地表述出一种“功能文化的模式”。而作为专题考古学主要分支的体育考古学,就是一种具有表述体育文化形态特征的“功能文化模式”。这类体育考古学,既有着自身的特点和逻辑规律,同时,它与其它专题考古学之间又有着网络结构似的关系;既是跨社会单元的大地域的文化系统,又是被包含于社会单元内的各类文化因素的分组。因此,从整体意义上讲,体育考古学是向大文化拓展的、整个古代文化系统的重要分支。

从本质上讲,体育考古学就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体育文化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特点并不仅仅在于鉴定某些体育文物的时代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以考古调查、发掘或传世之遗物和遗迹中与体育文化有关的实物为母体,对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实证性的分析、探讨,以揭示古代体育文化形态各个方面发展的历程和演化规律。它既是历史科学中考古学的内容,又是体育科学中体育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体育考古学与其它专题考古学分支和其它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在考古学和体育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 三

鉴于体育考古学本身的特点和其在体育科学、历史科学及考古学中的地位,其研究领域主

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年代史的研究领域。这是就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阶段而言，体育考古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史前时代的体育文化和历史时代的体育文化两大部分。

第二，个别和特殊文化形态的研究领域。这是就古代体育文化的具体形态而言，这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有体育运动形式（诸如具体的体育活动项目等）的考古研究、体育运动技术的考古研究、体育运动设施用具的考古研究及其它等等。

第三，区域体育文化的研究领域。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及民族习俗的不同，反映在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上，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规律和特点。以对中国古代区域体育文化的研究为例，仅就商周时期而言，即可分为6大部分，这6大部分分别是齐鲁体育文化、三晋体育文化、秦域体育文化、楚域体育文化、吴越体育文化和巴蜀体育文化。

我们知道，体育考古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遗物和遗迹。但是，古代体育是一种包括多种项目活动形式的文化现象，而且表现每一种活动形式或项目的体育遗物或遗迹，又会分布或包含在其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因此，体育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涉及多层次、多方面。这里既有对通过体育运动表现和体育运动技术而展开的身体训练领域和运动形式的研究，也有对同体育运动表现有关的其它艺术形式、社会制度与组织方式等的研究。当然，古代的体育文化，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形态，它和宗教、医药保健、娱乐、军事、杂技等其它的文化形态也具有密切关系。其中，除了文化形态上的交融，更有不同文化形态中表现其特征的“人工产品”功能的变化。因为，在一个母文化系统的各具体的子文化系统中，“人工产品”都有其原初的功能，但是，随着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系统结构的变化，原来在广泛的功能之内或之间所划分的时空界限也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原始生产实践活动中某些生产工具向原始体育活动器械功能的转化等。如此一来，就向我们提示出了这样一种原则：在体育考古学这一学科中，我们把研究对象限定于通过遗物和遗迹的分析，来对人类的身体科学和运动科学进行探讨，亦不能否定体育文化形态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在古代体育文化的体育考古研究中尤显重要。这样，由于体育考古学所存在的固有特征，其自身领域中的研究对象及其与相邻领域中的研究对象的关系反而可以明确起来。

体育考古学作为一种交叉性的新学科，有着自己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从主体上来说，是在具有与体育学相融的专业知识前提下，在考古学一系列具体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从方法论出发，体育考古学首先具有与考古学相通的系统的研究步骤和程序，这就是资料的收集、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以及综合性与理论性的研究。由于体育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体育的遗物和遗迹，因此，在资料的收集方面，首先要注重如何收集被分为遗物和遗迹两大类的各种体育活动的实物资料，接下来的便是对所收集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其中包括对有关资料的年代和具体运动形式归属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广泛地与各种相关学科结合，扩大研究范围，充实研究成果，经过归纳，加以提高，从理论上阐明人类古代体育文化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体育考古学的综合性与理论性研究的重要目的。

在体育考古学研究中，从方法而言，除了上述三个步骤和程序，它还有着在不同途径下的不同的具体研究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是历史分析法、类比分析法和模拟复原法。

体育考古学也是一门“历史之学”，它的研究离不开对其研究对象历史过程的考察。所谓历史研究法，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文献资料的应用和其它相关佐证的材料）追溯体育发展的纵的历史联系。这里既包括文献中的有关描述，又包括“实物”的体育遗存的“实证”，这是

历史研究法在历史时代体育形态研究中的重要基础,也是体育考古研究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至于类比分析,它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部分属性相同的情况下,进而分析出它们的另一个属性也相同的类比方法。在体育考古研究中,通过对体育考古资料的分析,运用类比方法,从当代社会(主要是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的考察中引出解释这些体育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体育文化主要内容和规律;而模拟复原,是在体育考古研究中对某些难以进行直接分析的遗存现象,根据其表现形式和特性,结合相关的民族学和民俗学及人类学资料,人为地建立或选择与之相似的形式进行复原研究,将研究结果类推到原型中去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交叉学科的体育考古学,其研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方法论而言,除了具体的方法,所注重的是以考古学的方法论为主,结合体育学的专业知识,在宏观上于理论的高度总结人类古代体育文化发展、演化的历史规律。

#### 四

体育考古学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为古代体育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通过其学科体系的建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将把古代的体育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将其形态发展、变迁的过程加以理论化,除了重建古代体育文化的物质构架之外,还要对古代体育文化的意识形态给予全面的探讨。对体育考古学这一新的学科而言,它既有考古学所规定的获取遗存的基本手段和研究遗存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又有着跨学科研究的鲜明特点,这也是历史科学、考古学和体育科学研究中各学科不同角度专门化探讨的发展方向。

崔乐泉

注释:

③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载《考古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崔乐泉:《图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出版,2007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体  
育  
考  
古

#### 栏 目 主 持 人 介 绍

崔乐泉:

1959年出生,山东省桓台县人。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成都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获考古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首位体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中国体育史学会秘书长、东北亚体育运动史学会理事。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近年来出版有《中国武术史》、《中国近代体育史》、《图说中国古代游艺》、《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奥林匹克运动简明百科》和《图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专著10余部。主编和参与编著《中国体育通史》、《中国体育思想通史》、《中华武术图典》、《体育科学百科辞典》、《二十世纪中国·体育卷》和《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等20余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关研究论文100余篇。多次赴国外及港澳台进行学术交流,并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大专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作学术讲演。

现主要致力于体育文化学、奥林匹克运动和民族体育学方面的研究。



# 体 育 考 古



图一、旧石器时代石镞（山西朔县峙峪出土）



图二、旧石器时代石球（山西许家窑遗址出土）



图三、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青海同德宗日出土）



图四、青铜时代球戏图岩画（云南省沧源县第6地点6区岩画）



图五、汉代女子蹴鞠图画像石（河南登封出土）



图六、唐代马球竞技图壁画局部之一（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



图七、元捶丸图壁画（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壁画）



# 体 育 考 古



图一、秦代灰陶蹲射武士俑(1974年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图二、汉代蹴鞠纹肖形印(故宫博物院藏品)



图三、战国行气铭玉杖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



图四、清人绘《导引图》养心导引式(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



图五、西汉《导引图》帛画复原图(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



图六、清人绘《导引图》练元精按摩式(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

(崔乐泉 供稿)